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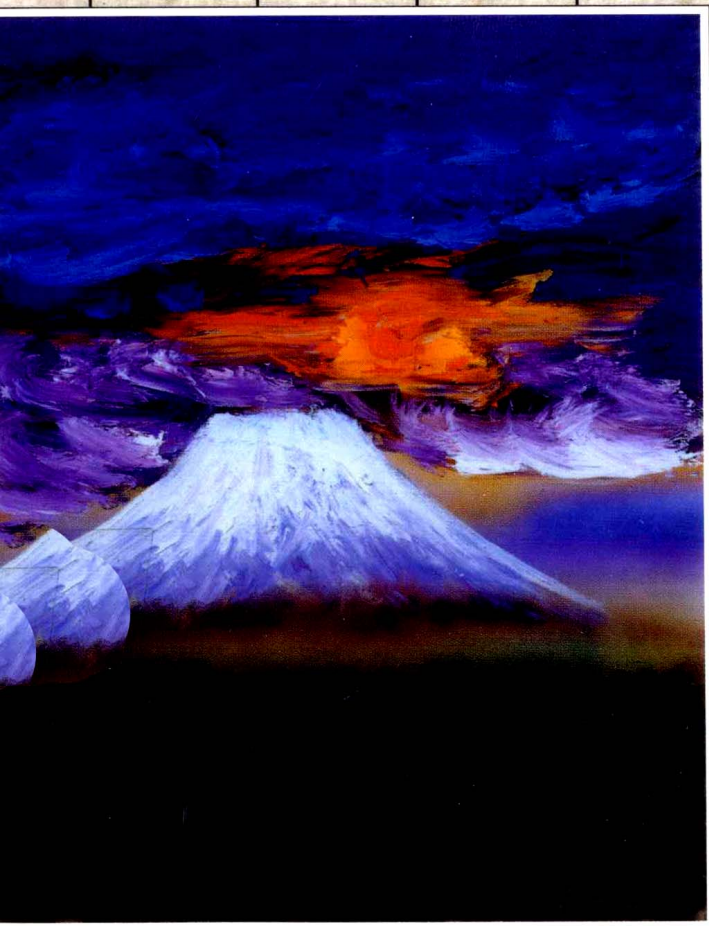
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从刊(5)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

第二辑

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主办

主编 王勇
副主编 陈小法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社



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与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签定学术交流协议

左：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 大庭修 教授

右：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 勇 教授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 第二辑

2004年10月15日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主 编 王 勇

副主编 陈小法

印 张 8.125 印张

字 数 25 万字

印 数 1000 册

定 价 22.00 元

出 版 国际文化工房

東京都江戸川区平井 5-22-9 田中ビル3F(〒132-0035)

ISBN 4-907676-25-5

目 录

纪念大庭修先生特集

卷首画

- 惜别之辞〔日〕藤善真澄(1)
大庭修先生的近世日中关系史研究〔日〕松浦章(5)
先师大庭修先生二、三事石晓军(10)
纪念大庭修先生赵刚(16)
初访大庭先生王宝平(22)

中日关系史研究

- 鉴真大师的文化遗产王勇(28)
试论“倭越同源”源自“於越”朱锡三(38)
论陈元赞对日本柔道的贡献杨向东(47)
围棋传日诸说吕顺长(59)
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墓志铭释读初探(一)葛继勇(78)
《宝篋印陀罗尼经传来记》史料考辨王力(84)
《支那开化小史》研究周建高(93)
中国古代史中的“徐福传说”考翟文栋(114)
琉球洋小考陆雅英(129)

中日关系史料

- 清末日语教科书简介李小兰(140)
明代郑若曾及其著述考陈小法(176)

译著园地

- 以法隆寺的尺寸测量历史〔日〕川端俊一郎(205)
汉诗与外交〔日〕村井章介(213)

学术动态

郑樵生与《中日关系史研究论集》·····	陈小法(233)
中日“书籍之路”的传播学观照·····	王 坤(242)
神道文化的集粹—读《神道与日本文化》·····	贾 莉(250)
《东亚海洋域圈之史的研究》一书介绍·····	陈小法(253)
后记·····	(257)

惜别之辞

〔日〕藤善真澄

陈小法译

平城十四年十一月乃难以忘怀之月。因为该月二十七日凌晨零时八分，皇学馆大学校长、近飞鸟博物馆馆长、关西大学名誉教授大庭修先生在大阪日生医院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六岁。记得刚一周左右前，接到来自先生的回函，对我所寄慰问信而表示恳挚谢意。先生在信中还说，已停止输液，病情趋向正常，所以不久之后就可以着手处理拖欠的稿债，当前争取再静养一些时间。这让我想到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与先生预定出版的《长崎唐馆图集成》书稿一事，因此请其家人转告先生务必不要过度劳累。但这之后，总有片刻的茫然自失。先生因患急性白血病而于无菌室接受治疗，所以谢绝探望。在三个月中，一味祈祷，坚信先生能痊愈，甚至连住院一事都不得不隐秘不宣。早知是这样，哪怕是隔着窗户再望一次也好，而如今只能平添无限悔恨。

知遇先生是我在研究生期间听森鹿三郎老师讲《唐律疏议》的进修班上。当时的情形还记忆犹鲜：一次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开始的最初研究会上，一位稍稍迟来、风度翩翩的青年绅士，取下戴至眼眉为止的礼帽，在门边就座之后，从容地从口袋里取出烟丝和烟斗，悠扬地点上了火。隔着桌子一见，似是不合时宜，可尽管如此，对于这位营造了文雅气氛的绅士，顷刻让人刮目相看。后来一位师兄向我介绍说他是圣心女子大学的大庭老师。噢，原来如此，这才完全明白。迨后，先生时与我打招呼，幸运

的是能与先生经常见面，并得到他的亲切教诲。还与先生一起促成了我的同班同学、现已英年早逝的窟川哲男夫妇的百年之好。不久我出任《史林》编委，立即就向先生约了《魏晋南北朝告身杂考—从木到纸》（41卷1号）一稿。此大作连同迄今为止的法制史，在拓宽以船载书籍为中心的日中关系史以及简牍研究等领域的过程中，是一篇标志性的作品。应当时龙谷大学的恩师石滨纯太郎和师兄三上谛听之请，先生调任至关西大学。没想在这之后，作为先生的同事三十年而蒙受厚谊。同时，今天又这样奉上追悼文，简直连做梦都没想过。

先生在就任某职时，曾在大学的报纸上写过一篇自我评传，题目为《常步大道之人》。这在古稀之年的专著《象与法》的后记中也有提及。一位骨相家称先生是“有太阳相”之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直至生命最后，先生一直领导着学术界、受众人注目、被寄予高度的评价和期待。正象月旦评所说的那样，先生乃永闪光芒、阔步大道之人。学位论文《秦汉法制史研究》以及副论文《江户时代的唐船持渡书研究》，都是领衔学界动向、富有时代气息的珠玉之作。尤其是后者，获得了一九八六年日本第七十六回学士院大奖，成为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研究》的桥头堡。与其说先生在各领域的研究上得出的结论备受关注，不如认为先生总以非凡深邃的解读力和对现状采取分析的态度而走在了时代最前面，对新领域的开拓总是有一种炽烈的情怀。记得学士院授奖大会结束不久，曾谈到庆功宴之事，“授奖固然可喜，但那是过去之事。”先生当时说了这样的话。还记得当时经片刻的迟疑后，对曾为准备庆功宴而忙得不可开交的自己顿觉羞愧难当。这次，和夫人闲聊时也听到了同样的话。如今更清楚地看到，受奖只是一个经过，先生始终贯彻的是不恋过去惟知前进的作风。

“大庭的构思有趣，着眼点独特。”这是我调任关西大学时听

到的森鹿三老师对大庭的评价。虽然听得出此话的弦外之音是让我以大庭的构思和灵感为榜样，但无奈资质不同而枉费了森老师的一番苦心。然而，森先生对弟子的这种信赖度，以及大庭不负恩师期望努力拼搏的精神，是多么让人羡慕的师生之情！

听说在因马王堆汉墓而引起关注的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决定在筹建的长沙简牍博物馆里，悬挂三位在简牍研究上取得先驱成就的日本人像，并展出他们的作品，他们就是森鹿三、大庭修、永田英正。先生从山东大学开始，继而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等等的客座或者兼职教授。同时还受聘多家学会的讲师，为日中学术交流留下了丰功伟绩。对于上述的喜讯，先生已经把有关资料都寄出了。但就在出席博物馆开馆仪式的不久前，先生住院并一去不返，这对于先生以及家人带来的遗憾就无需说了，体察相关人士的感受，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吧。现在只能在心里冥想师徒二人相会在净土以及相互握手祝福的情形，这多少也是一种安慰。

把引起世人关注作为研究动力的“常步大道之人”，同时把自身置于舞台上，在聚光灯下不得到喝彩誓不罢休，这从先生热心于各种不同职务这一点说明了一切。在关西大学里，先生历任学生主任、教学部长代理、教养部长、文学部长（二届）、图书馆长、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三届）、大学协议会协议员同理事、泊园纪念会会长（12年、在任）。大学外，自一九九三年以来任关西电视台节目审查会委员长，一九九四年由近飞鸟博物馆筹备会委员长而正式出任首任馆长。关西大学退休后兼任皇学馆大学校长。而先生如今却带着上述所有职务突然离去。在这里虽进行了逐个介绍但丝毫没有恶意。曾有怪杰之尊称的精力充沛的先生，其出色之处在于与一般人不同。对于从事领导岗位的人来说，要么是毫不犹豫中断自己的研究，要么是找借口而偷懒。但先生不仅以乐观的态度发挥其出色的行政才能，而且把繁忙的公

务作为飞跃发展的契机而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研究成果。因此成为了内外领头人也是在所必然。有时因迫于无奈也会私下要求同事参加校长候选等等，如今都已成美好的回忆。

晚年的先生，除哮喘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病，称得上是体魄强健之人。在其简直象挖掘机一样的旺盛活力中，首屈的当数其结实的内脏、倍于常人旺盛的食欲和研究欲、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安然入睡的秘诀。说其不太敏感可能有所失礼，但真让我这个天生体弱且有神经质的人羡慕不已。这也使我想起了宫崎市定先生曾告诫过的“没有智力、体力和财力成就不了大事”这一句话，现在是实在真切地感受到了。在十二月二十六日举行的盛大告别会上，致悼词的永田英正先生道出了“巨星陨落”一词，这也正是当初告知同事先生因患急性白血病而去世时，大家不约而同进出的感慨之语。合掌！

（作者系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

大庭修先生的近世 日中关系史研究

〔日〕松浦章

陈越译

能够用以代表大庭修先生近世日中关系史研究成果¹的，当属 1986 年被授予日本学士院奖的《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同朋舍，1984 年）。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意见一致吧。

由于此书的构成对于我们考虑大庭先生的学问体系非常重要，因此，试将其罗列如下：

正编 经由书籍传入的文化受容

序 论 日本的汉籍输入

第一章 江户时代书籍输入之概观

第二章 唐船持渡书的资料

第三章 汉籍输入之研究

附编 通过人员及船只进行的文化交流

第一章 享保时代来航唐人之研究

第二章 江户时代前期来航的中国商船

本书成立之端绪始于其担当江户时代、京都大阪汉学之研究的课题之时。这是科研经费支持下的以已故关西大学名誉教授石滨纯太郎为首进行的综合研究中的一部分。从江户时代日本尤其是各藩、藩校、汉学私塾等所持有的是怎样的汉籍等这类兴趣出发，进行调查，立足于江户时代输入的汉籍当中存在哪些类别这个视角，通过对保存了较多输入汉籍的内阁文库（现为国立公文

书馆内阁文库）中所藏汉籍的调查，以及对成为当时输入窗口的长崎进行的调查，发掘出很多在此前并未受世人瞩目的输入汉籍的目录类别。其最初的归纳成果就是1967年由关西大学出版部刊行的《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这一成果，受到了以亚洲史乃至日本史为专业的研究者们的关注。此外，大庭先生的兴趣逐渐扩展，还就向日本运送书籍的中国船、以及装载了汉籍驶向长崎的中国贸易船因遭遇海难而漂流到日本列岛等事实进行了史料的收集。此外，大庭先生甚至还谈到了作为对汉籍受容采取积极推进态度的德川将军德川吉宗对中国法典受容的典型例子——“大明律”，其受容是怎样得以进行的这一点，然而却在研究进行的中途便过世了。

让我们再回到《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不妨就大庭先生的关心所在来看一看。本书由正编和附编两部分构成，正编就作为中国文化受容具体表现的书籍在江户时代是怎样得以输入进行了阐述，而附编则是关于享保时代（1716年～1735年）来到长崎并在长崎贸易中发挥了人的作用的中国商人曾是怎样的一群人，以及曾被利用于海上航行的中国商船进行的研究。

换言之，此研究涉及到江户时代在长崎日中贸易中作为船载物品的书籍和作为其带来者的中国商人，以及搭载了两者的船舶这三者，可以说是集中了物品、人员、船只这三者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吧。

关于汉籍流入日本，始于古代，而正如我们认为证实其所在的最古的记载之一是《日本国见在书目》。日本自古以来对于大陆文化，一直采取的都是接受并且尊重的态度，而到了江户时代则是发展到极致，这么说丝毫不为过。但是明治时代以后，由于从接纳中国文化转向了西欧化，其极致成果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反而被人们所忘却。甚至，可以说，许多的日本人忘却了即使是这样的一个西欧化的日本，也是在江户时代以前接受大陆文化的基础之上逐渐得以西欧化的。大庭先生的研究便成为阐明此

问题重要性的基础。从这层意思上来看，要想研究明治以后日本文化的深层性，大庭先生的研究可谓是最好最佳的指南书。

大庭先生的历史研究以中国古代史、法制史见长，还广泛涉及汉代史中的木简、竹管、辞令书等告身的研究诸多方面，而这些研究的特色可以说均是以立足具体事物为基础的吧。可以试从《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中举出一例，以明确体现这一点。擅长法制史研究的大庭先生，其手法细致入微。在长崎贸易中，正德新例以后，对于来到长崎的中国商人，为了允许此后的来航，发给他们作为通商许可书的“信牌”。将支付底册“割符留帐”中遗留的一部分骑缝印的印面进行还原，虽然可以解读出印章的印文是用难以释读的篆书写成，但大庭先生最终弄清印文为“永以为久”（该书 442 页）。而他的这一阐明启示我们得出以下重要视点。

“永以为久”的印文，可以说是象征性地意味着江户时代日本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吧。明治以后至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近百年来，这种与日本人普遍所持的中国观明显不同的中国观，从“永以为久”便可以象征性地看到。

大庭先生的这种牵涉到细微之处的考证，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通过具体的事物来考虑历史的重要性，引导出即便跨越时代也无法替代的历史性评价，其重要性值得我们思考。

作为《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附编第二章“江户时代前期来航的中国商船”的先行成果，关于唐船，大庭先生曾经在《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五辑（1972 年）中发表了“关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13～49 页）——江户时代来航中国商船的资料”。其读后感我曾在《关西大学东洋史学研究室月报》第十五期（1972 年 4 月 26 日发行）中这样写道：

大庭修教授关于日中交流史领域的研究，通过其大作《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关于其他唐船持渡书的许多研究，以及“关于将丰臣秀吉封为日本国王的诰命——我国现存的明代诰

教”（《纪要》第四辑）²等的告身研究已经相当明确，其一贯的作风，就是在向学界公开新的重要资料的同时，不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而此次研究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姿态下开展的。

尤其，此次研究可以说为中国海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是因为，迄今为止中国海事史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文献资料为中心展开，而根据插图等资料进行的研究则可谓寥寥可数。

然而，本研究如果从资料的存在方式来说，由于被认为是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的资料，或许就会被误解成“唐船之图”中所见到的船只仅仅只来到了长崎，而这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这是因为通过以前的文献研究已经得以明确，“唐船之图”中所见的船只，是涉及中国远洋商船整体的缘故。在这层意思上来说，本资料的介绍，在研究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可以成为今后中国海事史研究的重要指针吧。

此外，在此研究中用到了《华夷变态》，很清楚地展现了唐船所进行的日清贸易的情形，不难想象，其中所指出的今后日清贸易研究上的重大问题，与在此研究中明确定义的“自由贸易兴盛的时代”³里，中国商人形成了怎样的贸易集团进行了贸易，此类问题的解决相互关联。

以上是我关于大庭修教授本次研究的读后感。

大约三十年前所写下的感想与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寄语于此读后感，权且作为大庭先生研究成果之驥尾，以此进行中国海事史研究，尤其为了阐明清代海船所进行的贸易形态，而研究⁴至今。

大庭先生每每进行研究，总是将其成果跨越时代给后生所带来的影响置于脑中，孜孜不倦钻研至今。大庭先生逝世时隔不久，相信这种精神即使跨越了时代也会继续留在世人的心中。

1 近世中日关系史相关著作如下：

《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

《宫内厅书陵部藏舶载书目》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2年。

《唐船进港回棹录·岛原本唐人风说书·割符留帐》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74年。

《江户时代的日中秘话》东方书店，1980年。

《宝历三年八丈岛漂着南京船资料》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85年。

《享保时代的日中关系资料一》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86年。

《安永九年安房千仓漂着南京船元顺号资料》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91年。

《享保时代的日中关系资料二（朱子三兄弟集）》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

《享保时代的日中关系资料三（荻生北溪集）》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

《德川吉宗与康熙帝——锁国下的日中交流》大修馆书店，1997年。

《漂着船物语——江户时代的日中交流》岩波书店，2001年。

2 大庭修《关于将丰臣秀吉封为日本国王的诰命——我国现存的明代诰敕》（《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四辑，1971年，照片6页29~77页）

3 大庭修“关于平户松浦史料博物馆藏‘唐船之图’（13~49页）——江户时代来航的中国商船的资料”《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五辑，34页。

大庭修《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515页。

4 松浦章《清代海外贸易史之研究》朋友书店，2002年。松浦章《清代台湾海运发展史》台湾·博扬文化，2002年。松浦章《清代中国琉球贸易史之研究》冲绳·榕树书林，2003年。

（作者系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先师大庭修先生二、三事

石晓军

《中日关系史料与研究》编辑部约我写一篇纪念先师大庭修教授的短文，我马上就应承了下来，因为觉得想说的话很多。然而一旦提起笔来，却又觉得头绪太多，不知道从何处下笔。我不由得想起了鲁迅的名作《藤野先生》。尽管时代不同，但至少在此时此刻，我和鲁迅先生当年的心境是相通的，即充满了对于异国导师的感激和怀念之情。

关于大庭先生的生平事迹、学术研究以及对于日本、中国乃至国际历史学界的贡献和影响，我想已无需我在此赘词。2002年11月27日大庭先生病逝后，日本东洋史学界一位著名学者使用的“巨星坠落”一语，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作为一名跟随大庭先生十余年，耳提面命，深受大庭先生恩泽的异国学子，在这里，我仅从一个侧面略微回忆一下先生的二、三事。

我首次接触到大庭修先生的大名大概是在大学快毕业时，即1981年前后。当时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读书，刚刚自学了一点日语，初生牛犊不怕虎，凭着一股热情就开始硬啃日文原版书籍。在当时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日文历史书籍中，大庭先生的《江戸時代の日中秘話》（东方书店，1980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当时我并不知道该书只是大庭先生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普及读物，更不知道大庭先生是斯界的大师级学者，只是感到该书份量适中，内容又深入浅出，所以就爱不释手。记得我当时曾

打算把该书翻译成中文，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且已经着手硬译了其中两章。后来因为感到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日文水平距离翻译此书都有距离，才将其搁置了下来（该书后来由友人徐世虹教授译成中文，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对于大庭先生的学问有了初步的认识。其后的攻读硕士期间，我开始有机会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记得大概是1984年或者1985年前后，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国际中日关系史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大庭先生。

但是，真正与大庭先生有交往，则是到了1989年前后之事。当时我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从事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与教学。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汪向荣教授引荐，我与大庭先生开始有了书信往来。其后进而承蒙大庭先生和汪先生的鼎力推荐，我有幸获得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THE JAPAN FOUNDATION）1990年度的赴日研究资助。在选择研究地点时，我毫不犹豫地就选择了大庭先生任所长的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围绕此事，我与大庭先生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很快到1990年暑假大庭先生访华时就给我带去了一份非常周密的赴日安排计划。看着大庭先生特意为我这个无名晚辈准备的日程表，我非常感动。当年年末，我便作为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外籍研究员，登上东行的飞机，投入了大庭先生的门下。

来到日本以后，截止我到姬路独协大学奉职以前，我一直在关西大学学习与研究：先是在东西学术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其后转而攻读博士学位；尔后又担任关西大学的兼任讲师。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访学、留学、教学三个阶段。而这三个时期又都是在在大庭先生的悉心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度过的，前后十年有余。个中所感所闻，回想起来，令人感慨万分。一一道来，恐为篇幅所不容，只能就其中印象最深之事略述一二。

众所周知，大庭先生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大学者，学贯东西，

不仅博大而且精深，分别在几个不同的领域——中日关系史（特别是江户时代的日中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古代史（秦汉法制史和简牍研究）以及文献目录学研究等方面都同时成为顶级学者，形成一种被称之为大庭史学的体系。在当今学者中比较少见。加之大庭先生器宇轩昂，常常给人不怒自威之感，又历任关西大学文学院长、图书馆长、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大阪府立飞鸟博物馆长、皇学馆大学校长等校内外各种要职。所以通常一提起大庭先生，人们的印象往往是一个威严十足的大学者。但其实大庭先生非常慈祥 and 细心，总是在百忙之中，尽一切力量帮助其他人，尤其是对于来自于中国的友人更是格外关照。在这一方面，从我刚到日本时就有很深的感受。

例如，当年我在准备赴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访学时，因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同时也邀请了我妻子一起访日，而妻一直在大学从事英语教学，也很想借此机会考察和比较一下日本的大学英语教育情况，所以我们决定同赴日本。大庭先生知道后，就特意给我们安排好了可供家属居住的大学研究者宿舍。但在具体办出国手续时，我们服务的原单位却提出妻子不能以随行身份出国。在当时的情况下无奈只好我一人飞到了日本。当时我和大庭先生并不很熟悉，所以当大庭先生问起为什么我妻子没有同来时，我便以工作忙离不开等理由搪塞了过去。但后来大庭先生得知真实情况后，立即表示可以接收妻子来东西学术研究所进修，并且针对妻子的研究课题，给妻子介绍了一位英国文学教授。而且还亲自充当妻子来日的身份保证人，就这样，在大庭先生的亲切关怀下，妻子才终于来到了日本。此事令我们非常感动，至今每每提起来仍然感慨不已。

在我们获得正式工作职位之前，不仅我妻子读研究生期间的身份保证人是 大庭先生，而且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大庭先生更是以导师和身份保证人的双重身份，不仅在学业上，而且也在